

## 新生代农民工的母语能力缺失与补偿

曾晓洁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史系, 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 由于所接受的农村母语教育是一种弱势的母语教育, 当前政府倡导的农民工培训体系也没有母语教育的应然地位, 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语言态度与使用间的矛盾、语言交际能力弱、汉语使用严重失范及缺乏良好阅读习惯等母语能力缺失的状况。母语能力的缺失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就业、维权、群体性地位。因此, 应在观念引导和气氛营造的基础上, 举行诸如普通话培训、演讲指导、口语交际、美文朗读等培训辅导, 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以语言交际力和阅读习惯培养为中心的母语补偿教育。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母语能力; 语言态度; 语言交际能力; 缺失; 补偿; 阅读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1)04-0039-06

###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ack of ability for using the mother tongue and compensation measures

ZENG Xiao-ji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unan First Normal College, Changsha 410002, China)

**Abstracts:**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received a weaker mother-tongue education, and the current training system of migrant workers led by our government pays no attention to the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As a result, many symptoms, such as weak communication skills, lack of self-confidence and good reading habits, appear in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lack of ability for using the mother tongue not onl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rights asserting and social status, but also contribute largely to their mental confusion. Therefore, the compensation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using mother-tongue, whose core is to cultivate linguistic self-confidence and reading habits, should be carried out.

**Key words:**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bility for using the mother tongue; language attitude;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lack; compensation; reading

母语能力指个体的母语应用能力, 主要通过语言规范度、语言态度、语言交际能力、母语阅读习惯等得以体现。作为个体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母语能力既是个体获得社会认可的入场券, 是总体素养持续发展的不二利器, 也是强大自我精神的不竭泉源。

学界针对农民工母语能力所进行的相关研究极其薄弱。谢晓明最早提出语言生活是影响农民工“融城”的主要因素之一。<sup>[1]</sup>接着, 夏历和刘玉屏

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农民工语言问题。其中, 夏历对北京和南京两地的农民工语言使用状况、普通话学习情况做了详细的分析, 同时还运用“言语社区”理论, 对农民工的语言问题进行了社会学视角的探讨。<sup>[1]</sup>刘玉屏则对浙江义乌、绍兴两市农民工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进行了调查分析,<sup>[2]</sup>并从语言学与社会学的综合视角出发, 提出了“农民工语言再社会化”的概念。<sup>[2]</sup>此外, 朱虹、李兴华、黄会欣、周大鸣<sup>[3-10]</sup>等所发表的专注于研究农民工其他社会问题的文章, 对农民工语言问题稍有提及, 但具体分析语焉不详。

总之, 目前对于农民工语言问题的研究, 主要视角是农民工“融城”过程中的交流问题, 主要集

收稿日期: 2011-06-02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YBB076)

作者简介: 曾晓洁(1974—), 女, 湖南洞口人, 教育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 语言教育。

中于农民工语言现状甚至仅仅是普通话的使用现状上,而当调查牵涉到语言态度时,主要考虑的也只是农民工对于普通话的认可度或农民工言语社区对于城市主流交际语言的影响度。也就是说,目前的研究,还只局限于农民工语言规范度这一最表层的问题,没有涉及语言组织能力、语言自信力和良好阅读习惯等母语能力对于农民工素质提升的重要意义。有鉴于此,笔者拟从母语教育的视角,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母语能力缺失的表现、影响及原因,并由此提出大致的补偿策略。

## 一、母语能力缺失的表现及影响

### 1. 母语能力缺失的表现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龄在16-30岁之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外出务工、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但户籍省份是农民工的劳动者。其特征是“三高—低”。<sup>①</sup>据2010年初的统计数据表明,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有60%的人是新生代农民工,并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以下简称“农民工”)。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面临的语言障碍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普通话较为标准,语言的规范程度相应较高。这与他们从小就开始接触以电视节目为主体的标准语音,所受学校母语教育的时间相对较长有关。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母语能力缺失的主要表现是语言态度与使用间的矛盾、语言交际能力、汉语使用严重失范以及缺乏阅读习惯。

(1) 语言态度与语言使用之间存在矛盾。此点突出体现在农民工对普通话和家乡方言这两种语言变体的语言态度及运用上。一方面,农民工对普通话的认同度很高。如夏历在北京和南京做的“农民工语言状况调查”的数据显示,受社会动机和地位意识的驱使,在京农民工对普通话的功能评价有极强的趋同性,绝大部分农民工都认为普通话的使用范围广,用处多。在对普通话的地位评价中,经济地位的认同度最高。农民工对说普通话的心理接受程度以及对自身普通话的期望程度都很高。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工喜欢说普通话。对自己普通话水平期望达到“熟练很标准”的占到了近40%,对自

己普通话期望达到“熟练比较准确”的近35%。同时,农民工对子女会说普通话的期望程度也很高。在京农民工对子女会说普通话的态度十分明朗,基本集中在要求“他们一定会”或是“希望会”的程度上,“不希望”的没有,“不太希望”和“无所谓”态度的所占比重很少,两项合计不到5%。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农民工接受普通话以及说普通话,仅仅是在必须要讲普通话的场合。一旦离开陌生人的场景,回到自己熟悉的老乡集聚的生活圈子,他们又特别排斥普通话,对自己及子女保持住家乡话的态度非常坚定。进一步分析发现,他们对普通话和家乡方言的认同与否与他们离乡距离的远近有关。打工的地点距离家乡越远,他们越容易接受普通话而淡化家乡方言,反之亦然。调查显示,湖南永州市农民工大部分于城郊结合的居民之中租廉价房居住。很多一起出来的老乡和在打工中新认识的同乡往往居住在一起,以便有个照应,这让他们保持了同一种语言(家乡话)小聚居环境,语言的使用上往往形成小圈子。因此,农民工对家乡话的认同感非常强烈,尤其是同一个乡镇的(永州下辖的各县区有土话和官话外,各县区下辖的乡镇之间语言也有很多不同,如道县平话和道县官话差别就很大,新田、江华两县南面乡和北面乡之间很多语言互相之间听不懂等),一旦听出语言相同,互相之间的距离就会拉得很近,亲切感也会非常强烈。正因为如此,他们语言的使用也有较明显的顺序:首先是在同乡之间使用当地的土话,外人一般很难听懂。同县区之间往往使用当地平话或通用语言,同一县区或同一语言区的人能听懂。不同县市区的人员交流一般就使用县区官话。最后,才是使用普通话。<sup>[8]</sup>

(2) 语言交际能力较弱。语言交际能力指在面对具体情境之时,如何组织语言进行合适应对的能力。口吃、结巴是语言交际能力低下的最明显表现,但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文化水平极其低下者当中。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语言交际能力不高主要是指在变化了的语言环境下话语应对之时的文不对题和辞不达意。“文不对题”通常发生在受话者(阅读者)对发话者(写作者)的话语意义出现理解偏差之时;“辞不达意”则与之方向相反,是发话者(写作

者)不能自如到位地向受话者(阅读者)表达内心意图。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过程中,经常性地出现这种情况。以“中国青年农民工网”的“新市民论坛”栏目中的受访农民工自述为例,虽然已然经过采访者或网站的整理修饰,但绝大多数农民工的自述仍然表现出表述不集中、东拉西扯、偷换概念等语言交际能力较弱的特征。在面试、访谈、维权等口头交谈,辞不达意的现象更为普遍。一项关于永州市青年农民工的语言交际能力的调查也说明,农民工在面对变化了的语言环境,因语言的不同和身份的缺位而得不到平等的语言交流的情况下,最初表现出来的都是手足无措,不能很好地适应,有的干脆就保持沉默,与人交流是能省则省。

(3) 汉语使用严重失范,汉字书写字迹潦草,错别字泛滥。一项关于农民工求职简历的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字实在不敢恭维,很难找到一份字迹工整、卷面整洁的求职简历。<sup>[2]</sup>尤其是“个人自述”部分,这是可以充分看出农民工的书写功底。但大多农民工连最基本的行文格式都不规范,有的字写得很“秀气”比蝇头还要小几分,卷面横七竖八、乱涂乱画……汉字成了难以辨认的画符。一篇关于求职的100字不到的简历中,最多竟然出现10个错别字,少的也有3个。如“依依不舍”写成“衣衣不舍”,“默默无闻”写成“默默无蚊”,“无懈可击”写成“无鞋可及”,“发挥自己的长项”写成“发挥自己的长向”,等等。标点符号使用也极不规范。

(4) 缺乏良好的阅读习惯。新生代农民工大都接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对精神生活也十分渴求,但新华社的一项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四成农民工竟然连一本书都没有。在887份有效调查问卷中,585名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占8成)表示自己“一本书都没有”。<sup>[7]</sup>由于缺乏阅读纸质书籍的习惯,农民工的闲暇时间多用在上网、蹦迪、泡吧或者打牌、聊天、睡觉上,很少有人会利用下班后的时间阅读书籍。虽然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喜欢上网,其中一部分还在网上开通了个人博客,但因为日常的工作较为繁重单调,他们最主要的网上活动还是集中

在聊天、玩游戏或者寻找新的工作上,真正进行网络阅读的很少。可以认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所倾向选择的休闲方式,或许确实可以使人得到暂时的快乐与放松,但却无法能够像良好的母语阅读那样,或者为人提供更多资讯,或许使其心灵变得日益强大。

## 2. 母语能力缺失的影响

母语能力的缺失,直接影响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维权、群体性地位,并最终影响到其整体精神面貌。

(1) 影响就业及收入。方言和很不标准的普通话以及由此导致的语言交际能力差,在很多情况下限制了农民工就业的机会。在一些普遍使用普通话的行业里,他们很难找到适当的岗位。不少农民工只能靠熟人、老乡介绍工作。如湖南永州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市农民工有75%是通过亲朋好友的介绍进城务工或经商的。为数不少的雇主听不懂方言土话,农民工只好请别人帮助自己表达想法和要求。<sup>[8]</sup>不仅如此,农民工的语言交际能力与其经济利益有着密切联系。农民工进城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赚钱,而进城后,普通话在农民工的语言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农民工无论是就业还是与人交流,都离不开普通话。夏历在北京和南京做的“农民工语言状况调查”的数据显示,40%以上的在京农民工收入较高,其原因在于“普通话说得好,容易找到一份好工作”。普通话说不标准,语言交际能力差的农民工就只能从事环境封闭、条件较差的工作。这无疑会减少其务工收入。

(2) 影响维权意识与维权能力。农民工维权是目前较受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一般认为,社会地位低与维权成本高是农民工维权难的主要症结。其实,除此之外,母语能力的缺失也是导致农民工维权难的重要原因。在预防各类侵权事件的过程中,母语能力的作用尤为突出。因为维权意识的提高,除了社会的宣传,关键还在于农民工自我的参与。如果农民工具具备良好的阅读习惯与阅读能力,就可以从相关案例、基本法律或社会宣传中了解如何避免黑中介、计算加班工资、签订与解除劳动合同、争取社会保险、进行工伤鉴定和劳动争议仲裁等维

权常识;如果农民工本人拥有较强的语言自信力,在意识到可能被侵权之时,就能够主动去跟老板交涉。这种防患于未然的举动可以有效地避免劳动争议或侵权案件发生。应该说,很多农民工维权意识不强,主要是由于他们缺乏阅读习惯,知识面窄。在权益被侵害之后的维权工作中,对于农民工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是表达与申诉,口头与书面语言表达能力的作用不言而喻。由于他们的母语能力欠缺,导致农民工维权能力低。

(3) 影响农民工的群体性地位。在城市生活中所受社会尊重不够,是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满意度低的重要原因。致使农民工受社会尊重不够的因素很多,母语能力相对缺失是其中最容易被忽视而实际上影响却相当大的一个因素。因为,在户籍限制日渐松动的当下,所谓“城里人”与“乡下人”的最主要分野就在于个体的见识与素养。“语言是人的第二件衣服”,是人存在的标签,语言能力也就成了个体素养中最显而易见的那一部分。可以想见,对于一个能够自信而得体地表达自我意思的农民工,不管他的衣着情况如何,都没有人能够轻易对他产生轻蔑之情!况且,语言还与思维密切相关,通过日积月累的表达训练与阅读吸纳,个人的思维方式能够得到极大改善,精神状况与性格品质也可相应地得到极大提升。也正因如此,坚持写诗的青年农民工才会受到各种媒体的广泛礼赞,咖啡厅服务员也才会在电视节目“读书达人”活动中备受关注。

## 二、母语能力缺失的原因

农民工母语能力较低,原因既在于其母语教育先天(步入社会务工之前)的弱势与不足,也在于社会继续教育培训体系中母语补偿的后天缺失。

### 1. 学校母语教育欠缺

首先,优秀师资严重欠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就是80后农村学生接受基础教育时,适逢农村教师的逆向流动。工资补贴、住房、培训、晋升等方面待遇以及生存环境的差异,导致大量优秀教师从农村地区向城镇或其他省份的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向条件更好、收入更多的学校流动,向待遇好的民办学校流动。这导致农村优秀教师资源

的严重不足。“孔雀东南飞,留下麻雀一大堆”就是对该现象刻薄而生动的写照。其次,农村教师编制制度存在缺陷。按当时的编制标准,很多农村教师跨学科、跨年级教学,甚至有些班级因缺少教师而无法开课,出现“超编缺人”的矛盾。农村学校教师补充机制也不完善。随着各地相继取消了中等师范学校,农村小学的教师难以补充。此外,学科结构不合理,教非所学现象严重,教师专任率不高,这都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就母语教学而言,语文教师大多年龄偏大,普通话极不标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语文教师课堂教学时干脆使用本地方言。还有一些语文教师并非中文专业毕业,自身没有接受过严格的语文训练,母语素养浅薄。第三,高考制度恢复的同时也强化了应试教育。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一样,课堂教学全部围绕高考,结果除极少数幸运儿跳出龙门之外,其他农村学生的综合素质没有得到有效培养。语文课上除多读了几本语文教材之外,语言交际能力、母语书写、语言自信力、良好的阅读习惯等真正应该提高的母语能力,没有得到应有的训练。

### 2. 家庭母语教育的缺失

农民工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父母大多外出。这对留守子女的数学、英语成绩影响不显著,但对小学生的语文成绩尤其是阅读能力,却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sup>[10]</sup>当然,这也不难理解,父辈外出打工,祖辈很难肩负起监管孩子学业的责任,他们的监管最多到督促孙辈完成作业而已。至于字迹是否工整、书写是否有错别字,他们无法细致检查。而课外阅读却不像一般作业那样易于考核,这样,留守儿童的阅读练习就必须全靠孩子本人的兴趣与自觉,加之农村课外阅读材料较为匮乏,农民工在学生时期的阅读习惯总体偏差当然也就在预想当中了。如果横向比较,城乡之间的社会母语教育差距甚大。调查显示,<sup>[11]、[12]</sup>在城镇,普通话正成为众多孩子的第一语言,农村孩子则因语言环境和家长语言教育能力的限制,语言发展水平总体滞后许多。

### 3. 农民工再教育体系不太重视母语能力的补偿教育

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已经引起了国家相关部

门的高度重视,如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制定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就是一个明证。但是,目前所倡导的农民工培训侧重于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安全知识等方面,忽视了母语培训的重要性。这也难怪,农民工的生产经验、技能与文化水平之间是一种非直接的关系,所以无论政府部门还是相关学者,都习惯于从直接经济功能去认识教育培训的功用,习惯于强调可以直接提高工资收入的经验、技能类职业培训,而很少注意到母语补偿对于提升农民工精神所具有的深刻力量。当然,更深一层说,从“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传统教育一直强调的不是金钱就是官位,过于实用地突出了人的物质性,忽略了人之为人的高层次精神需求。目前的农民工再教育体系,也自然受到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尽管,从2005年以来,教育部和其他相关单位以及半数以上的省区市开展了农民工普通话培训,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系统的母语补偿教育培训一直付之阙如。

### 三、母语补偿的可能措施

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针对弱势群体展开的母语补偿运动,如民国时期国统区的民众教育和解放区的扫盲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识字改革和“文革”期间的大兴农村教育等等,这些运动的成效不一,但却都以识字为主,是最低层级的母语教育。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现今母语补偿的主要对象是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根据前面的分析,之所以要对其进行母语补偿,主要是要藉此提升其就业能力、维权能力、群体性地位及个体精神面貌,并从而最终助其精神解困。为此,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进行的母语补偿,主要方向当为语言交际能力、语言自信力及阅读习惯的培养。具体而言,农民工的母语补偿,应从这一个群体的母语水平及生活现状出发,采取以下相应的可行性措施。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推广母语补偿也要尽量观念先行。目前,绝大部分农民工都乐意接受教育补偿,至于补偿的内容,据吴红宇、谢国强统计,“学

好一门过硬的技术是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98.78%)最强烈的愿望。”<sup>[13]</sup>可见,农民工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技术中心观(这跟社会导向以及国家农民工培训体系内容有关)。所以,在思想上,首先要通过宣讲阅读价值、倡导文化资本来破除这种纯技术观。教育施受双方均应明白,母语补偿带给农民工的,不仅是个人语言能力的改观,是一种现实的或可能的生产力,有利于其在追求自由、爱和美的过程中实现精神解困,更可以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往下传承,对于子孙后代来说也将是一笔无形而极其宝贵的财富。当然,必须说明的是,破除纯技术观,并不是说要用母语补偿教育来取代技术教育。事实上,母语补偿与技术教育并无内在矛盾,因为,母语教育是一种随在的教育,并不需要太多的专门时间,只要改变观念,完全可以运用零碎的时间和日常生活来加以训练和培养。这种利用零碎时间进行的阅读,还可以让人之“作为人”的生机得到重新焕发。

同时,也要设法营造一定的母语学习氛围,因为氛围营造既有助于观念改变,也符合母语学习的特征。以阅读为例,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少数甚至刚刚跨出校门,书本和阅读对他们仍然颇有吸引力,再说,他们平日的生活也不那么充实,据统计,在问及“城市打工生活,您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时,“22%的男性民工、30%的女性民工选择了‘空虚寂寞’。”<sup>[13,14]</sup>但问题是,阅读通常被看作有钱有闲人的事,对于身处次属劳动力市场中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阅读就可能要承担受人耻笑的风险,而如果阅读被公开倡导的话,情形就会因此迥然不同。除舆论倡导外,也可以成立以车间或其他基层组织为单位的读书会,规定一些优美的小品散文或优质中短篇小说,隔一段时间举行一次朗读比赛或者读书笔记评比,以此培养阅读习惯。单位图书室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很多工厂比较注重添置体育设施,有的还不惜重金装备电脑房,对传统的图书却不太重视。其实,电媒阅读与纸媒阅读相较,前者的优点虽然很多,但后者却更有利于反复揣摩,更适合悠游自在的品性的培养。

在观念引导和气氛营造的基础上,还应争取举行一些集中的培训辅导。母语补偿教育的培训基本

上不需太多投入。各个部门都可以因地制宜地举行一些相关的辅导培训。比如,普通话培训、演讲指导、口语交际、美文朗读等。

当然,农民工的母语补偿决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民工的母语补偿问题,就必须回到事情的原点,回到农村语言教育。鲁迅先生九十年前就呼吁“救救孩子”,农村语言教育也是一个救救孩子的大事,不让农民工输在起点,首先就是不要让他们输在语言的起点。2004年开始实施的“农村高中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和2006年出台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方案”,已经从语文师资上解决一部分问题,而也许只有把语文教育理念从“服务高考”转变为“服务个体母语能力”,才能从根本上帮助农村儿童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母语滋养,从而为其日后的精神富裕做好基本铺垫。

#### 注释:

- ①参见夏历《农民工的语言状况》(《长江学术》2007年第3期)、《城市农民工语言学习研究》(《修辞学习》2007年第5期)、《城市农民工用语现状与发展趋势》(《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城市农民工的语言资源和语言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农民工言语社区探索研究》(《语言文字运用》2007年第1期)、《“言语社区”理论的新思考——以在京农民工言语共同体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5期)。
- ②参见刘玉屏《农民工语言行为的社会文化解读——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个案》(《修辞学习》2008年第3期)、《农民工语言使用情况调查——以浙江省绍兴市为样本》(《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农民工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个案》(《农业考古》2009年第6期)。
- ③首次把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特征归纳为“三高一低”的是钱入磊《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状况调查》(《中国乡村发现》2007年第3期)一文。“三高一低”指的是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这一概念目前已经为学界所公认。

#### 参考文献:

- [1] 谢晓明. 关注农民工的语言生活状况[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6(4): 59-62.
- [2] 刘玉屏. 农民工语言再社会化分析——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个案[J]. 中国农村观察, 2009(6): 37-44.
- [3] 郭乙辉. 在城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嘉兴市为例[D]. 浙江大学, 2008.
- [4]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几份调查[J]. 观察与思考, 2010(3): 44-47.
- [5] 栗平.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需求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 [6] 许晓芸. 农民闲暇生活的特征及其优化路径[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1(3): 36-41.
- [7] 朱虹. 打工妹的城市社会化——一项关于农民工城市适应的经验研究[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版, 2004(6): 52-57.
- [8] 胡清华. 湖南省永州市农民工语言状况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09.
- [9] 黄会欣, 马前广, 刘电芝. 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及其对社会认知的影响[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6): 148-152.
- [10] 周大鸣, 程麓晓. 农民工的职业分化与子女教育——以湖南攸县为例[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6): 30-37.
- [11] 彭泽远.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的调查[D]. 中国人民大学, 2008.
- [12] 李子华. 贫困地区初中生阅读能力现象调查及对策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02.
- [13] 吴红宇, 谢国强.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利益诉求及角色变迁——基于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析[J]. 南方人口, 2006(2): 21-31.
- [14] 谢建社.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农民工融入性教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27.

责任编辑: 陈向科